

達維亞選出三百十五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二百一十一名(佔百分之六六點九八)，⑦拉脫維亞選出三百十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二百十四名(佔百分之六九點〇三)，⑧塔吉克選出三百十五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一百七十六名(佔百分之五五點八七)，⑨土庫曼選出二百八十五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一七六名(佔百分之六一點七五)，⑩喬治亞選出三百九十九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二百八十名(佔百分之七〇點二)，⑪阿捷爾拜疆選出三百八十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二百六十二名(佔百分之六八點九五)，⑫立陶宛選出二百九十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一百九十九名(佔百分之六八點六二)，⑬吉爾吉斯新選出三百三十九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二百二十二名(佔百分之六五點四〇)，⑭亞美尼亞選出三百一十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二百一十三名(佔百分之六八點七一)，⑮愛沙尼亞選出一百七十八名代表中新當選者一百三十一名(佔百分之七三點六零)。從上列十五加盟共和國代表中新當選者均佔多數，很顯明的看出俄共新領導者藉此次例行的改選之機會，將四年前黑魯曉夫所安插之份子予以清除。

(二)根據以上分析，此次改選可以看出俄共新政權有下列動向：①非黨員代表比例之增加，婦女代表人數之增加，各選舉區均有投反對票人數，

表示蘇俄是一個「全民的國家，全民的黨」，并加強宣傳毛共是一個軍事官僚獨裁的政權。②此次選舉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俄共中央書記等領導者均分頭赴各選舉區演說，競選，并多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宣傳毛匪反而降低農生活水準。③俄共新政權從黑魯曉夫下台二年多以來，布、柯、波戈尼三頭，對外分頭訪問各國以加強外交攻勢，對內處處以俄共中央，蘇俄部長會議，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三機構分權領導，表示三頭馬車領導方式加強，以打擊毛匪個人獨裁。

重要參考資料：

- (一)蘇俄憲法
-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一頁
- (三)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真理報」第一頁
- (四)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真理報」公佈選舉結果
- (五)蘇俄十五共和國地方報紙
- (六)問題與研究第二卷第八期「蘇俄各加盟共和國選舉分析」
- (七)一九六五年三月全俄地方選舉三月十九日「真理報」公佈選舉結果

蘇俄往何處去？

良銳譯

本文作者李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為西德最著名的蘇俄問題專家。李氏於希特勒執政時期潛赴俄國，以難民身份寓居俄國多年，嗣委派為東德共黨官員，後逃往南斯拉夫，最後返回西德。李氏著作甚豐，包括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蘇俄共黨理論批判」。

本文旨在討論另一蘇俄問題學者賈德爾(Michel Garder)的名著「蘇聯政治制度垂死的掙扎」。按該書於一九六五年出版，學術界為之轟動，各國研究蘇俄問題學者對該書曾引起熱烈爭論。

譯者誌

一 前言

「共產主義問題研究」雜誌編輯同仁，邀請各方對賈德爾先生所著「蘇聯政治制度垂死的掙扎」一書，發表意見。賈先生係用特殊的手法，處理這

本著作。他在書中揭發蘇聯共產制度現存的矛盾現象，并以他所謂的「醫學診斷」，對該制度的前途加以預測。賈先生在該書最近德文版問世之際，對其論據的範圍加以擴大，並對書中要點特別強調。筆者對蘇聯政壇現有矛盾現象及其進一步之演變，提出不同的假設，并對賈先生的論點加以討論。

賈氏在論述蘇聯現行制度下，共黨官吏與工業技術智識份子間的衝突，文內能洞悉蘇聯政治制度之殘缺，其間所存在嚴重的矛盾現象。他寫道：

「目前，在蘇聯統治階層裏，黨的官吏與高級工業技術智識份子間，存在着實質上的衝突。所謂高級工業技術智識份子，係指蘇聯科學家、大學教授、工廠管理階層等人員而言。由於新一代的崛起，這種衝突必然趨於劇烈；……這些智識份子，乃蘇聯全國人民的精華。無法避免的，他們認為，大勢所趨，非奪取政權不可的時期，將會到來。」

不可否認的，所謂黨幹部與高級工業技術智識份子之間，不僅存有許多矛盾，甚至有顯著的衝突。不過，兩者間的矛盾所形成的鬥爭，最後能否導致工業技術人員奪取政權一節，頗值得吾人研討。

首先，吾人不可忽略一項事實，此即高級工業技術人員中，具有黨員身份者，佔相當大的比例（按近年來由百分之三十一增至百分之三十五）。同時，為數甚多的高級工業人員，在黨的組織階層均佔要津。固然在黨組織裏，教條或保守勢力，遠較工業技術團體的保守勢力為雄厚，但這種情形亦并非絕對的。其中很多黨員，具有雙重身份，在黨的組織裏，為革新派，然在工業技術團體中，彼等却傾向於教條與保守。關於經濟改革，最近曾發生這種事例：很多經濟學者與工廠管理人員，以這種改革，將會侵犯中央經濟管制制度為理由，而反對經濟改革。高級工業智識份子的雄厚反對力量，由蘇聯經濟改革之父，李普曼教授著文時，曾予以暗示。前此，蘇聯經濟論壇報社論編輯委員會，召開一次規模甚大的研討會，這次會議的召開，很清楚的顯示出工業技術高級智識份子的雄厚力量。與會者多達一千餘人，都是工業界管理人員，經濟學者，黨理論家代表，俄共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代表。俄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史特巴可夫（V. Stepanov），在會中宣佈：不僅黨政官員反對這次經濟改革，并且實際負責經濟部門的人士，對這次改革所產生的後果，十分關切，對經濟上管理措施的擴大運用，亦表示不安。

這種例子甚多，均說明工業技術智識份子與黨的組織關係，不應該和「改革思想」與「教條上的偏見」相提併論；政治浪潮，有時會沖破這些政治集團的。因此，根據黨方與工業技術集團間的矛盾衝突，所獲致的結論，很難與現在的實際政壇風雲相吻合。

二 關鍵問題的所在

賈先生所強調的黨方與工業技術集團間的衝突，實際上祇是一個更嚴重問題中的一部份而已。此一問題，乃是蘇聯目前政治制度，是否能夠適應國內外的變遷，以及如何適應國內外的變遷。國內的變化，其主要特點為社會影響力不斷在增加，這種影響力由工業界的活動全部顯示出來。國外的變遷，乃由種種國際問題所促成：原子時代的到來，共產國家自治能力的增強，殖民地紛紛獨立，亞非許多新興國家的出現，凡此種種，均在在說明，不僅是施政方法亟需改變，而其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尤需改革。蘇聯目前實際爭論的問題，是從何處着手改革？以那種規模與採取何種速度實施改革？在何人領導下完成政治改革？從這些辯論中，吾人不難看出蘇聯現存的政治集團，及其政治觀點與傾向，從激進的革新份子到教條保守官吏。在持續不斷的激烈辯論中，「史達林問題」極具份量，業已成爲辯論的要點。一如往昔，辯論者對史達林個人及對史達林時代施政的看法，乃成爲他們對政治制度改革的試金石。對史達林個人及其制度的批評，愈具體愈激烈，則在社會、經濟、政治、理論與文化方面，對史達林主義愈容易摒棄。相反地，對史達林時代各種嚴酷措施，愈至曲地加以重視，如同最近數月來官方的論調，則對未來的改革工作，愈容易採取遲滯行動，或愈會將改革工作局限於狹隘的範圍。質言之，對政治改革看法上的不同，對實際改革工作，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至於蘇聯社會必須採取的政治途徑，此一問題，端視蘇聯在未來新工業社會裏，共黨所担任角色的高下而定。

三 黨的功能

根據蘇聯領導階層相繼發表的，具有理論根據的願望，蘇聯共產黨在未來時期，同時承擔以下的職掌：

- (一) 爲共產主義理論的解釋人（蘇聯共產黨譬爲「精神力量的泉源」，「現時代的靈魂與智慧」，「蘇聯人民生命之光」）。
- (二) 爲政治權力的主要工具（蘇聯社會的指導者），黨領導階層制訂政

治綱要，黨的組織階層執行政治上重大決策。

(三)直接參與經濟上的實際問題，此即黨為經濟與工業管理的機構，并負責製訂與執行各種經濟問題實際細則(諸如水泥製造的特殊問題處理，棉紗工廠每排房屋間距離的規定等)。

實質上，這些職掌經常相互矛盾。蘇聯工業的規模日益龐大，其複雜性亦隨之增加，黨在調和理論與實際職掌方面，因而日趨困難。最近幾年來，從蘇聯國內地方黨部(現達三十一萬四千個)權責迭遭變更來看，不難窺出黨與工業界之間的隱衷。因此，以往黨的「對生產工作加強注意」的指示，現在已改為「不可陷入現實的錯誤」的警告，「將黨的組織會議與生產會議相互混淆」，與「集中貫徹政治工作與黨理論」的建議。然而幾個月後，上級政策又有改變，黨又恢復到以往「對生產工作加強注意」的指示，黨最高階層的混亂與紛歧，因而暴露無遺。

黨方在對黨幹部訓練計劃中，企圖彌補有關相互矛盾的職掌。數年前，四年制的黨幹部學校，課程分為兩大部份：蘇聯實用經濟課程約佔百分之六十，共黨理論課程約佔百分之四十。其目的至為明顯，在訓練經濟與共黨理論知識兩者兼備的黨官僚份子。然則此舉并未消弭職務上的矛盾。因為接受這種教育的男女黨員，須履行政治理論所賦與的職責，同時由於經濟上的挫敗，而招致敏銳公開的指責；另一方面，彼等亦須竭盡所能，謀求經濟問題的解決，因而必須與工業界人士採取一致說法，這種做法的結果，經常受到「真理報」失去黨性」的責難。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黑魯曉夫實施黨內改組，將黨內組織劃分為工業與農業黨部，黑氏當時極端重視政治上重大事件，企圖賦與黨新的工作任務。這次黨的改組亦鑄成錯誤，改組工作不僅鹵莽而突然，形成職務上的重疊，并引起黨幹部的普遍不滿，而且不能實際解決問題。黑氏原定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黨的改組被取消，反而促成了黨內許多困難問題的解決，不過問題的本身，仍依然存在。

黑氏下野後最初數個月，有關共黨在蘇聯國內的任務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仍依舊存在。黨幹部均要求，黨仍須對各方面加以掌握，包括對經濟方面各項細節的處理權限。另一派主張，經濟事務各項細節的處理權責，應劃規各加盟共和國或經濟部門。持這種意見的一派認為：黨在經濟事務方面，對各加盟共和國與經濟主管部門，僅作政策上的指導，而不應取代其執行的權力。這一派曾作如下的警喻：「黨的領導職掌，如同樂隊的指揮，其職責在

求各演奏人間之協調，而不在親自演奏樂器。」問題在於演奏人既不遵循樂譜，亦不聽從指揮人的拍節時當如何處置，尤以一樂隊同時由兩位指揮(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率領演奏時為然。

四 經濟的混亂

黨的領導階層，深悉在推行許多矛盾職掌中所遭遇的困難。黨方經常呼籲：將理論與實際密切配合起來，然後再灌輸在黨的工作上，然則執行起來，困難重重，很難生效。黨的高階層，面臨解決工業界許多困難問題，惟恐放寬對工業界的管制後，將其權力與影響力從而喪失。最近黨方表示，由於「過份關注」經濟問題，可能會使黨的組織失去其特性。很明顯的，蘇聯共黨并未(至少目前尚未)放棄它在經濟與工業技術部門所担任的角色；同時，經濟部門的各級黨部當竭力阻止威脅其權力的任何發展。

根據賈氏對蘇聯經濟問題的看法：一九六五年三月的農業改革完全失敗，同年九月所宣佈的工業計劃，竟導致空前的混亂，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前，工業界領袖們認為很少可能恢復其舊觀。賈氏甚至預測，蘇聯共黨制度將在「一九七〇年時總崩潰，按這項預測與蘇聯新五年計劃有關。他寫道：「為明確指出蘇聯共產主義總崩潰的時間，我採用蘇聯新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七〇)預定完成日期為指標。」

蘇聯經濟問題固然困難重重，然而賈氏對蘇聯政權克服經濟困難的能力卻估價過低。過去許多經濟計劃均未完成，經濟上的改組雖形成一時的混亂，但是這些現象，并不足以說明蘇聯政權必將崩潰。相反地，從各種徵候來看，蘇聯經濟有逐漸好轉的趨勢。數月來，黨方對一九六一年十月黑魯曉夫所鼓吹的十年與二十年「共產黨大計劃」(顯屬過份樂觀)，已經隻字不提了。「這一代人將目睹共產主義實現」的保證，近來已不多聞。無疑的，反對黑氏主觀主義的全部運動中，其特徵之一，為批評黑氏經濟計劃目標之不切實際。

蘇聯經濟政策之核心問題，在於經濟目標，政治困擾與蘇聯領導階層三者間的矛盾與衝突。黨的本身，的確關注蘇聯經濟的發展，并希望儘速建立共產主義物質與工業技術基礎。欲實現這項目標，需要各方面的大肆改革，包括工業界管理人員權力的擴大，上級對下級控制的放寬，計劃與制度上彈性的增加，合理的價格制度的建立，物質獎勵的增加，工人參與工廠管理(如僅限於部分工人)，以及農業的迅速改革。這些措施，祇是經濟制度改革

中的一部份而已，而這種改革，對黨的高階層，經濟部門及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會產生甚大的影響；這些措施，一旦付諸實施，則將削減黨對經濟事務的影響力。

在蘇聯報端，亦可間接窺出經濟改革所導致許多的討論與爭辯，討論問題的重點，在於採用新經濟管理制度時改革的範圍與改革的速度。蘇聯報紙經常談論，經濟改革過渡時期是一個複雜漫長的過程，這說明政治上反對力量甚為可觀。下面一段是蘇聯報刊反應政治壓力的典型文字：「有些黨員對於新的經濟改革，祇是口頭上擁戴而已，實際上他們對改革的可能性甚感疑懼。」

假如我們僅談政治方面，暫不提傳統上的資金分配問題，那麼經濟改革問題可分為兩方面：第一是物質鼓勵與精神獎勵之間關係的問題。保守派認為：過份提倡物質鼓勵，會養成蘇聯人民祇重視「盧布」，而使人民的道德淪喪。第二是黨在工業界的權責。最近數月來的討論，甚多黨幹部建議：工業界管理人員負責物質鼓勵，黨幹部負責精神獎勵。在第二十三屆共黨代表大會籌備期間，黨組織官員根據大會黨章規定，要求禁止經濟部門官員參加黨的活動，這項要求雖招致黨官方的譴責，但一般認為工業管理人員，不應「順理成章」膺選而整居黨的要津。

從這幾點看來，可以說明一項事實，此即蘇聯經濟不振，其中最主要的政治因素，不在於經濟改革所導致的混亂，亦不在於新五年計劃無法付諸實施，而是在於經濟目標與政治權力及利益間的衝突。

五 領導權的繼承

賈氏在結論中指出，克里姆林宮正在進行着權力鬥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黑氏下台，即已揭開蘇聯馬列政權垂死的掙扎。他指陳這場鬥爭，各方均在手忙脚亂的情形下進行，鹿死誰手，目前尚難分曉。即使最後有一方勝利，他預測新的政治制度，必將是單元領導。目前黨的組織與各加盟共和國尖銳對立，遠比以往任何時期為顯著。賈氏基於此點寫道：

「蘇聯權力鬥爭，無論如何不可避免，在未來歲月裏，這場權力鬥爭所引起的變動，其影響所及將深入黨的基層。」

對賈氏而言，這場鬥爭將是蘇聯政權進入另一個艱苦階段的開始。他指出蘇聯領袖繼承問題，由於黑魯曉夫的下台，業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他對蘇聯共黨與政府官僚的摩擦所作評論，堪稱獨到精湛。不過，筆者認為蘇聯領袖繼承問題，關鍵在於上述政治的矛盾與爭辯。預測未來蘇聯政權誰屬的問題，下列兩大因素甚為重要。

第一是蘇聯最高的職位，一年多以來，始終由兩個人以平分秋色的地位

蘇俄往何處去

維持着，這種情形與往昔的「二頭政治大相逕庭（一九三〇—四一，史達林—莫洛托夫；一九五三年九月—一九五五年二月，黑魯曉夫—馬林可夫；一九五五年三月—一九五八年九月，黑魯曉夫—布加寧）」，因為以往的「二頭政治」居首席至為明顯，毋需猜測；即使目前這種「二頭政治」局面終將分裂，改為一元領導，但布加寧與柯錫金，已為未來真正的「二頭政治」制度首開先例。

第二是在有保障的程序下，行有秩序的政權移交，這種需要，由於黑氏的下台，較以往任何時期更為迫切。黨的中央組織與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人員，均熱烈希望，蘇聯憲法與黨章內有明文規定，闡述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功能與地位的定義，任免的規則，職責與權力的劃分，以及選舉第二書記的程序規定。這種制度上的改革，勢必將擴大到全黨的組織系統，而目前全黨各級職掌，均係以臨時授權指派任務，並無固定權責職掌。目前對於領導權繼承問題的討論，黨的領導階層進退維谷，處境甚尷尬。在某一方面，他們必須維持既有的權力，保持行動自由；在另一方面，他們必須遏阻一個新興的，力量強大的，足能打倒他們集體領導的勢力的出現。蘇聯新憲法遲遲未予公布（數年前宣佈：一九三六年製訂的憲法，業經成立修憲委員會予以修正），必定是修改後的憲法，對於領導權繼承問題的規定，在措辭方面尚未獲解決所致。

六 共黨理論的前途

賈氏深信，在現階段權力鬥爭中贏得勝利的一方，定將唾棄馬列主義理論，他寫道：

「蘇聯高階層智識份子，早已承認馬列教條荒謬無稽，這些教條，即使對千萬的凡夫走卒，也已真相大白。」

賈氏根據以上的觀察，在結論中指出：「未來的蘇聯領袖們，即使比現行統治者更為偏激，亦無需仰賴理論教條的支持，去統治蘇聯。」

雖然蘇聯共黨的理論懸憂重重，但吾人不可忽略，理論中某些教條與證據，對黨性堅強的黨員與羣衆中的部份人民，仍具有控制約束力量。筆者認為：蘇聯共黨將不會放棄這些理論教條，因為這些理論教條，在蘇聯國內社會中，會輕而易舉的為共黨取得今日合法的權益，并在國際共產集團中，業已獲致特殊的地位。自黑氏下台後，馬列理論在政治上作用，一直在貶值中。舉例而言，共黨理論階層領導人地位的爭奪，以及黨理論如何適應國內外新的形勢所引起的爭論，自黑氏下野後迄今仍爭執不休。賈氏所謂「馬列宗教」絕非金科玉律一成不變，實際上目前正在突變中。從許多已經變質的理論中，僅列舉幾點，以資佐證：史達林構想的「包圍資本主義國家論」的擴

果；「戰爭避免論」，「國家共存論」；「對西方統治階級複雜的分析」；「民族解放運動」（包括國家民主的過渡時期）；以及「西方工業國家從和平過渡時期到社會主義」。在國內方面，蘇聯領袖們業已放棄史達林主義的：「從過渡時期到社會主義，應加強階級鬥爭」；對共產黨的性質與地位，作更廣泛更富彈性的解釋，共黨戰略與戰術的修訂；新的理論構想的建立（「過渡時期到共產主義」，「全國人民專政」，「全民黨派等」）。最後一項為共黨對敵人（慣用走狗等狠毒字眼）攻擊已較以往減少甚多，對純政治上的問題，使用軍事術語亦大量減少。

從以上各點看來，今後問題不是蘇聯是否會揚棄馬列理論，而是蘇聯以何種速度改變她的理論，將理論改變到何種程度。蘇聯現在對以往忽略的，甚至攻擊的科學，諸如社會學、心理學、遺傳學等，一部份理論家認為應列入馬列理論，但另一派理論家認為，應與馬列分開，保持獨立地位。

有關理論的研討，他們認為對黨理論的挑剔，是十分愚昧的舉動，因為他們都隱藏着一個重要的政治上的構想，此乃維持馬列主義為一切行動的指針，作為解決社會一切問題的工具。蘇聯共黨無法再事忽略各種科學對共黨理論的挑戰，如將這些科學注入馬列理論，不啻是將共黨理論的單純性與簡潔性予以破壞，甚至可能損壞它的說服力。很明顯的，這是共黨最感尷尬，而無適當解決的途徑。不過，就是這種僵局的存在，並不能預示共黨理論的結束。筆者樂觀的看法：共黨理論在蘇聯製訂實際政策方面的影響力將大為減少，蘇聯人民的生活，不受共黨理論支配的範圍將愈趨擴大。蘇聯共黨終將設法把現代的社會科學與過時的馬列理論結合在一起。

七 蘇聯政治制度的展望

賈氏所舉的蘇聯政治上的矛盾，導致他作出令人驚異的結論：「這個政權必將崩潰，乃至為明顯，問題祇是這種垂死的掙扎究竟能維持多久，將於何時結束而已。」他的理由是：「蘇聯執政黨無法解決它面臨的問題，因此在其內部權力鬥爭中，它敗亡的命運是無法挽救的。」崩潰的時間：「我們的看法，以馬列為宗的神權政治下垂死的掙扎，將不遲過一九七〇年。」對蘇聯政治制度未來改變的預測，賈氏認為：「按照邏輯的推理，這種演變無論是和平的或暴力的，蘇聯的未來將會形成一個以工業技術為主的，社會主義的，並且相當自由的民主國家。」

筆者認為，以上的預測，值得商榷之處，為賈氏對蘇聯政權的適應能力估價過低。蘇聯共黨的確面臨上述各嚴重問題與矛盾。然而，假如吾人仍能記憶史達林逝世後，蘇聯國內與國際共產主義所作的重大改變，假如吾人認為蘇聯統治者應付國內外變遷與挑戰，的確具有其相當的能力，吾人便不難

看出：對蘇聯現行政治制度，根據她的缺點與實力所作的實際研判，指出該制度正在「作垂死的掙扎」或「革命」，理由似欠充分這種說法很難成立。預測是一種很危險的聯想，然而，在對蘇聯的前途作各種不同的預測當中，筆者認為蘇聯的政權會在一種緩和的情況下逐漸演變。最近數月來，蘇聯領袖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合理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全體人民政治活動上的控制；在這種情形下，對人民政治活動的控制逐漸加強，甚至對反史達林運動的措施作部份的取消（對以往史達林的犧牲者，在態度與觀點上的改變，對急躁的「文化路線」與對日丹諾夫的再評價等的改變）。蘇聯領袖們，要想在開明的經濟政策與在政治上鎮壓人民之間，調和鼎新，幾乎是不可能的。基於此點，筆者認為反史達林運動的陷於低潮，祇是暫時的頓挫，最後畢竟會有更激進的政治改革。

蘇聯未來政治上的分化，對於政治上的改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分化在過去十年來至為明顯。目前出現在蘇聯國內的各種利益集團（包括工業集團、科學集團、軍人集團，文教集團等），日趨壯大，逐漸難以駕馭。這些集團將會要求施政當局減少對彼等的政治干預，並賦與更多的自治權力。對這種權力要求的批准，最初僅限於少數階層，後來必然會導致多方的改革，並且會使政治上的紛歧更具體化。

這種政治上的演變，也是諱莫如深，很難預測。這種演變，必然會從蘇聯政治上的傳統作風及現行機構中產生。蘇聯領袖們，一方面受到低階層要求改革的壓力，另一方面受到統治階層激進份子要求更開明的政策，在這種雙重壓力下，蘇聯領袖們勢必要給與他們比較真實的選舉權，這就是說，對地方黨部與各加盟共和國主要行政官吏的選舉，候選人將不祇是黨內人員，一定會包含各方面的人士。各工廠管理人員所參與生產會議，對於有關政策的製訂，會賦與更多發言權。至於各部會與學術團體的報紙及刊物，目前均為黨的傳聲筒，改革後發言權當會增加，至少在某些特殊事務方面，能代表所屬單位發言。這種改革對蘇聯共黨影響至大，甚至對黨內部改革，所舉行辯論與討論，發言尺度亦將會放寬。

這種改革，一旦付諸實施，其過程不但不輕鬆順利，並且會波折頻仍，困難叢生。教條保守派與激進革新派之間不斷的競爭，其衝突結果，（各派內部，對某些特殊問題，其意見亦不會趨於一致）並不一定對激進革新派有利。因此，在未來改革過程中，吾人可以預見，當局會採取壓制的手段，一如現階段的政治措施。不過，這種勢力每次競爭結果，蘇聯政治制度與社會型態，或多或少，會從黨及其理論的阻撓力量中獲得一些解放。筆者認為，未來的蘇聯會循着這種方式逐漸演變，所具有的可能性，較之賈德爾先生預測蘇聯政權在一九七〇年即將迅速崩潰的可能性為大。